

鲜为人知的地下抗日组织“华文协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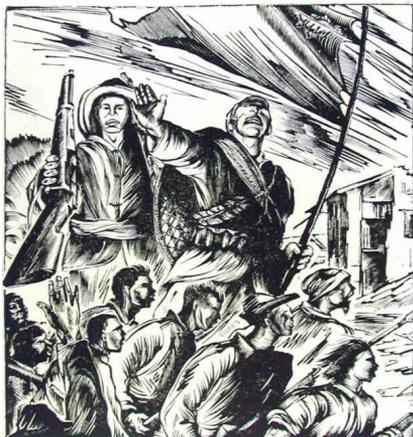
■ 赖 晨

在华北沦陷区，曾经存在一个叫做“华北文化教育协会”（简称“华文协”）的地下抗日组织，在北平、天津、太原、济南、开封等地均有其影子，它团结沦陷区的知识分子，抵抗日寇，打击汉奸，动员社会，控制华北，巩固了中国政府的影响力。那么，它是怎样成立的？其主要领导是谁？有过怎样的活动？最后命运如何？

背 景

抗战爆发后，持续不断的战乱和迁徙，原有的政治生态被打乱了，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不存在了，各股政治势力争夺更加激烈。当国民党在重庆稳定之后，就开始把目光投向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和青年，尤其是文化人集中的北平和上海，希望在此两地恢复和发展党务。其目的是防止他们被日伪笼络或倒向左翼，保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正统对于文化人与青年的影响力。

日寇加强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，不少学者投敌附逆。早在1920年，日本就在北平成立了“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图书馆”，由日本文化特务桥川时雄主持运作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工程，笼络了85名中国学者参与撰写、整理。七七事变后，虽然大批学者迁徙到大后



方，但仍有不少学者因为种种原因滞留在北平。他们或迫于形势，或战前与日本的深厚渊源，不可避免地发生分化，甚至有人投敌附逆，参加各种敌伪组织的活动。

随着战线的延伸，日寇必须维持敌后治安稳定，消弭中国人的反抗思想，需要武力之外的文教支持。1938年8月，日本动员了30多名一流文化精英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北平，进行文化侵略。8月30日，所谓的“东亚文化协议会”成立典礼及第一次大会在北平召开，汤尔和、周作人、张大千、陈垣、钱稻孙等学者参加。3个月之后的1938年12月1日，“东亚文化协议会”第二次大会又在东京参加了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长汤尔和率21名学者参加了，这次大会确立了对中国文化侵略的体系、思路、计划等。这次大会的背景，是日本急于恢复沦陷区的治安，以配合在广东、武汉的战

争，企图建立稳固的殖民地统治。

为了改变不利局面，国民党地下北平党务人员争取由沈兼士（辅仁大学文学学院院长）出面，建立抗日文教团体。北平沦陷后，沈兼士受教育部委托，维护辅仁大学校务，滞留北平，与英千里（辅仁大学秘书长、兼辅仁大学附中校长）、张怀（辅仁大学教育学院院长）等秘密组织“炎社”，取顾炎武的炎，以示抗日。1939年8月18日，吴若僖（国民党天津党部书记）和高挺秀（北平市党部书记）向重庆的朱家骅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）报告：准备请沈兼士、张怀、英千里、张重一等出面，罗织辅仁大学、燕京大学、中法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和北平中小学校的教职员，组织文教团体，由沈兼士主持，由高挺秀负责日常事务。

1939年9月17日，“华北文化教育协会”正式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立案了。第一、组织：主持人：沈兼士；15名委员，总会设在北平，天津设立分会；内部分高等、中等、初等、社会教育四个组。第二、工作：吸收思想纯正的各级教职员和文化机构工作人员，半年内发展到300人；在平津开办小学、中学若干所，以收容教导抗日同志子弟；救济坚贞不附逆的高级文化人，以介绍工作为主，以津贴为辅；选派忠实可靠的同志

打入敌伪教育机构,从事抗日工作;输送忠实青年参加游击区及后方工作。第三、费用:会务费每月500元;文教同志救助费每月1500元;中小学津贴每月1000元,合计每月为3000元。

组织成立

1939年12月17日,“华文协”天津分会成立了。委员为赵伯陶、路秀三、伍克潜、刘仁等6人,赵伯陶为主席委员,路秀三为书记,分调查、救济、教育、宣传四个组,由委员兼任各组组长,均无工资,每月经费为1500元。

“华文协”北京总会(北平文协总会)的成立却一波三折。沈兼士不肯出山,他对高挺秀表示,自己在沦陷区担任教职,殊觉不安,不愿意参加什么“华文协”组织,只愿意每周和他见一次面,见机行事,量力而为地为抗日作出一定贡献。高挺秀再三动员,沈兼士总是以虽有爱国热忱,但现实环境恶劣,要么由中央派员主持,要么取消已经泄密的组织,另起炉灶。

朱家骅致电沈兼士,要他出山:“平津为日伪文化中心,敌伪诱胁方急,青年学子,万不可无人领导。会事务请积极推行,此间同志企仰正殷。”1940年1月10日,沈兼士回信朱家骅,表示不方便出山。理由是:成立“华文协”并每月从重庆领取3000元经费的机密已经泄露了,现在是满城风雨;假期内,辅仁大学中的神父和学生,均有被捕的,校内敌伪侦探十分严密,近两月来,北平城内被破获的地下机构甚多,组织“华文协”风险很大;他不愿意接受国民党中

央的经费,愿意保持独立自主的身份;他有参加抗日活动,比如在开学后送了一批辅仁毕业生南下服务,在校内创办了两种杂志,以联络学者们;他希望和重庆直接联系,来信不要天津分会转交,而是通过罗马梵蒂冈主教转交给在辅仁大学的德国神父代递,以保证自己的安全。

经过高挺秀和朱家骅的一再劝说、协商、慰藉,沈兼士终于同意出山。沈兼士化名章毓庵(分别用则“毓”指沈兼士,“章”指张怀,“庵”指英千里)。要求朱家骅介绍平电台关系,或建立专用电台;在北平不能直接通电之前,请朱家骅直接赐给专用密码,交给沈兼士。1940年3月,北平党部电台遭到敌伪破坏,北平与重庆的联络须由天津代行,不利于保密,沈兼士坚持与中央直接联系,以便保障其安全和开展工作。

1940年9月,“华文协”北平总会成立了。该会以委员会为总首脑机关,下设干事及工作员。委员四人:沈兼士、张怀、英千里、高挺秀。沈兼士为主席,高挺秀为常务,负责计划主持及推进一切工作。干事承委员之命,执行各项工作,由四名干事联络消息及文书、事务、会计、组织青年团体、驻沪联络站等。干事有郝德元、常惠、葛信益。工作人员辅佐干事,分任各项事物,共2人,1任收支,1任交通。

主要活动

北平文协总会以“联络操守忠贞之士,网罗有志青年”为宗旨,从事了以下活动:第一、组织

学术团体。如中国语文学研究会(沈兼士主持,联络国学家与优秀学生,研究中国文化,以引起民族思想,并坚定其自信力)、中小学研究研究会(张怀及外围同志余君主持,联络教育学者及中小学教员,研究建国教育方法,逐步实验,以抵制奴化教育)、文艺社(由英千里主持,使青年有正当读物,在辅仁大学名义下掩护发行2种刊物,一是纯文艺刊物——《辅仁文苑》,一为综合刊物,即《辅仁生活月刊》)。第二、利用临时集会进行宣传。举办了美术展览会、摄影展览会和辅仁大学校友返校节。第三、组织青年团体,以操控各大中学及破坏敌伪团体。如清俭学社(即青年建国学社)、亭林学社。前者由高挺秀负责,就原有团体改组,高挺秀任书记,下设社务、事务、助理。清俭学社从业务有:建立5个集体单位、树立7个骨干;破坏青年党,调查自学会,输送有志青年南下,指导中学生升学,调查日本国内情况,协助外国学术团体;后者由华奇负责,主要业务为联络北平三校同志组织团体,介绍人才南下服务,利用实验室制造特种药品。第四、随时调查操守忠贞、思想纯正的教员、学生、公务员等,予以介绍职业,辅助前往大西南、大西北后方服务就学的盘缠等救助。第五、安排“华文协”成员打入沦陷区中小学任校董、总务、教员,联络中小学,抵制敌伪奴化教育。

北平文协总会还计划从事如下几项工作:第一、充当“猎头”。调查登记在平各项专门人才,报请中央征用,密切联络他们,促使他们自动南下服务国家,或代筹

南下路线或资助盘缠。第二、扩大青年救济与组织训练,养成抗战建国的有用人才,免被敌伪收买利用。第三、建立学术报国阵线,于各大学选定思想纯正、资望隆重的学者,聘为委员,建立骨干成员,分头联络,加以组织,鼓吹学术报国,造成普遍风气。第四、搜集沦陷区的新闻,调制有关本会工作的各项统计表,以备研究运用。第五、宣传敌人阴谋和酷虐暴行,唤起民众对敌伪的仇恨心理。第六、筹办《文史杂志》,以组织动员学者,组织专家学者,给他们一个发表研究心得的平台,繁荣学术,引导舆论,给学者优厚稿费,解决其生活问题。

沈兼士、高挺秀一直和朱家骅保持联系,经常向其报告工作。如1941年春,北平市国民党地下党部改组,英千里等人因要改就任党部书记,退出北平文协总会,总会不得不进行调整。为此,高挺秀潜回重庆汇报,沈兼士致电朱家骅:他已经吸收了董洗凡加入北平文协总会,化名丁伯强,请给予其职务,以便开展工作。

朱家骅不断给北平文协总会指示。1941年春,他说:“北平文教工作重要,务请大规模扩展。”4月7日说:“平市为文化中心……故我方文教工作较之其他省市尤关重要。各级教员及毕业学生,爱国家、爱民族之心人皆有之,启迪联络及如何发挥其力量,以为他日收复失土张本,正有待于诸君之继续筹划推行……”4月25日,他表扬北平文协总会工作“收效甚宏”。朱家骅认为华北文协工作,北平比天津重要,将天津分会的预算减少为月1000元,北平则从月

1500元增加为2500元。并且不顾天津分会的不满和中央财政的困难,坚持要有关方面设法满足。可见其对北平文教界的极端重视。

结 局

1941年12月7日,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北平形势日益险恶。先是英千里被告密遭日寇逮捕,囚禁了3个月,后来又有文人在敌伪报纸上发文,变相向敌伪告密,说沈兼士将办一个国学刊物,李霖野将办一文学刊物,征集社会上家居不出学者的稿件,稿酬甚厚,经费有“固定来源”。

1942年2月,沈兼士向重庆发来告急电文:环境险恶,许多地下工作者被捕,辅仁大学经费告竭,敌伪将乘虚侵入,他将和总干事撤退到重庆。朱家骅虽复电表示欢迎他来重庆,但实际上他很不甘心放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北平地下组织。4月11日,他致电沈兼士:中央补助款将汇到辅仁大学,由宋子文、胡适从美国募捐的款也将汇来。北平组织将彻底整顿,另设电台,另布交通网,妥觅汇兑路线。以后避免横线联系,化整为零,分别负责,文教协会及刊物应独立活动,仍由君全权办理,秘密地作北平党部外围组织,与其他单位绝对隔绝。已派徐敬仁赴平,五月底将抵达。兄如不能继续安居时,宜及时离开。

在极端困难的前提下,沈兼士又在北平坚持了半年多,直到1942年12月16日,在被列入黑名单,敌宪将实施抓捕的情况下,沈兼士才在地下工作者常维钧、葛信益的保护下,和三女沈节,逃离

北平,进入西安。果然,30日,敌伪特务到沈兼士家逮捕他,此时沈兼士已经安全地抵达大后方。日本人不相信沈兼士已离开北京,于是一方面在沈家留下几个特务,只许人进,不许人出,防止走漏风声,另一方面派人四处搜查,远至西山一带——因为沈兼士曾经在那里休养过。1943年元旦,辅仁大学的顾随、张星烺、孙子书三位教授到沈兼士家拜年,结果被扣留了十几天才释放出来。

此后,“华文协”继续坚持活动,在最盛时会员有几百人,并以辅仁大学校友会为联系,在开封、济南、太原等地设立了分会。

1944年2、3月间,日本为了作侵华的最后挣扎,大规模搜捕地下抗日组织和工作人员。1944年3月11日本宪兵队逮捕了英千里,并从他家里抄出“华文协”主要会员名单。21日,校内外“华文协”的骨干几乎全部被捕,如校内的师生张怀、董洗凡、徐侍峰、欧阳湘、赵锡禹、左宗伦、郑国栋、左明彻、孙硕人、朱锦章、葛信益、赵光贤、叶德禄、高婴齐、吴师循、李凤楼、秦晋、孙金铭等30多人被捕。经过4个多月的关押审讯后,日寇华北军事法庭把“华文协”主要负责人张怀、英千里、董洗凡、英纯良等分别判处15年监禁,其余人员分别判处7年、5年、3年、2年不等的徒刑。遭此重创,“华文协”遂告瓦解。

被俘的“华文协”骨干们,在日寇监狱里坐了一年多牢,受尽日寇各种酷刑的折磨,从而落下不同程度的终身残疾。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屈服,直到1945年7月15日,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,才获得自由。